

感恩就是干好该干的事

李后强/文

外甥女大婚,我们整个家族都沉浸在欢乐与幸福中。

外甥女出生那年,我考上大学。整个大学的假期,回家后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到姐姐家把姐姐和外甥女接回我们家,一路上抱着外甥女,到家里逗她玩。她的成长过程,也是我们姊妹几个收获快乐的过程。

然而,她十一岁那年,姐姐家遭受了灾难。姐姐不得不带着我和我的八岁的外甥离开已经变得冷漠的老家,寄宿到刚刚结婚的妹妹家,开始了艰难地生活。从此时到她参加工作的十三年间,除了妈妈和我们姊妹几个外,没有任何人跟他们来往,更不用说帮助了。其间,姐姐不分冬夏、餐风沐雨地在街头卖过小吃,不分远近、不计轻重地在外地打

过工,我们姊妹几个纷纷赠他们钱物,妹妹和妹夫不辞劳苦地照顾他们姊妹两个的生活和学习。每逢春节,妈妈都把姐姐和他们姊妹两个接到我们家共度春节。尽管开始我们都很艰难,但终于保证了他们姊妹两个生活无忧,学业不受影响。

外甥女大学毕业后,经过层层选拔,竞争到了到银行上班的机会。姐姐为此高兴、自豪,嘱咐她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记着报答帮助过他们的人的恩情。

她拿到首份工资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姐姐买了一身衣服,请姐姐和外甥到饭馆吃了一顿饭,还给我的女儿买了玩具,交代我以后不要再管外甥的学费和花销了,从下个月起由她负责。姐姐更是高兴和自豪。我们也为之高兴和自豪。

她上班的地方离家有十多公里,坐公交需要将近一个小时。然而,不

管晴天雨天,她从未迟到过,也没有早退过,几乎每天都是早五点多起床,晚十点多到家。累得筋疲力尽的她,从来没有抱怨过,甚至没有说过累。这样,经过三个月的试用,她转正了。她也是他们同时入职的人中第一个转正的。

转正后的外甥女更加努力地工作,参加他们银行组织的所有比武活动,而且稳居各类比武第二名。这样,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分行领导的重视。工作一年后,她由柜员转岗到会计。两年后,她由支行转岗到分行会计部。

在会计部工作的一年多时间,他们分行开设新的支行时,会计业务统归由她培训。由于她的专业和突出表现,其它银行也纷纷慕名聘请她去讲课、培训。这种八小时外的活动,不仅增加了她的收入,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她的知名度,更主要地是,锻炼了她的综合能力,

进一步增强了她的自信。

工作四年后,她被提拔为支行会计部经理,开始了管理者的职业生涯。

外甥女不仅工作表现突出,承担家庭责任也毫不含糊。自从她上班之后,家庭的水电费、吃饭花销和我外甥的大学费用都是她负担的,每个月还给我姐姐200元零花钱。逢年过节,对我们姊妹几个也是礼数尽到。大姐买房,妹妹生病,弟弟过年,我外甥女都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姊妹几个儿女的生日,外甥女也必然礼物奉上。除此之外,姐夫家族的亲戚只要开口,我外甥女也必给他们适当地帮助。

外甥女这次大婚,老家来了50多人,住了一到三天不等。他们都对外甥女的成绩啧啧称赞,对姐姐和姐夫充满羡慕、尊敬和感激。她的同事和学生到场了200多人,烘托出喜庆的氛围。

看到外甥女有那么多好朋友、好学生,听着老人家重复多年来从未说过的好听话,姐姐和姐夫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但我知道:充盈他们内心的主要是自豪、幸福和满足。姐姐和姐夫终于扬眉吐气,心情舒畅。

由此我想,在这个把“感恩”视为人的基本素质的时代,也许我们该认真思考:究竟怎样做才算感恩?

我以为,所有帮助我们、祝福我们、鼓励我们、教育我们、对我们抱有希望的人,都是我们的恩人。这些恩人并非都渴望从我们这里得到物质回报。只要我们像我外甥女一样,把该做的事做好,就足以让这些恩人感到快慰,感到幸福。真正的感恩,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

邓子强/文

每读《服务与参谋》,总会想到一个问题。阅读能使人快乐么?细察之下,大凡读书且得出快乐结论的人着实不多。想必快乐并非著文和阅读之根本。

但每每游走在《服务与参谋》的篇章中,不仅体验到了阅读有快乐,而且感受到了作者著文的快乐。突然想起了弗朗西斯·培根的一句名言,“读书足以怡情,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博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原来,快乐绽放在智慧之书。

《服务与参谋》这本智慧之书,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李后强教授从不惑之年到天命岁月十年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示,记录的是四川十年风云变幻。由于后强教授从地方官员调任机构幕僚,研究了国家及四川省许多重大战略问题和若干热点难点问题,特别是参与了一些重大决策过程,因此这些篇章都源自国内外报刊或内部刊物发表的文章。也正因为这样的经历,才提炼汇聚成就了这本智慧之书。

其实,智慧是两个词。佛家认为,明白事相曰智,了解事理曰慧。《大乘义章九》也说,“照见名智,解了称慧,此二名别。”智者明白事物发生的过程和表象,而慧者更能理解事物发生的内在原因。大智者善于处理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

快乐在智与慧中绽放——读《服务与参谋》

而大慧者长于思考现实提出的理论问题。读《服务与参谋》,犹如和智者探讨时事,又如与慧者修炼内心。

智慧之书,智在当下,直面问题,频出奇招,招招制胜。作为大智者,后强教授行走着思考。行走地震灾区,他提出了“灾后产业振兴;重在解决好六大关键要素”,“重建文化”是人类的宝贵财富”;行走边远农村,他看到了“新农村综合体:农民的幸福家园”,“产村相融的‘金茂探索’”,提出“四川现代农业的突破口:走以畜牧业为主的道路”,“加快‘镇级市’建设是大势所趋”,要“开展农民科技培训,提高农民致富能力”,“以群众满意为最高标准大胆推进统筹城乡改革试验”;行走在民族地区,他想到了“关于把甘孜州海螺沟景区建成四川旅游经济开发试验区的建议”,“打造诗意泸沽湖,建设摩梭新家园”,“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完善民族区域政策”;行走在工厂车间,他认为“抗击金融危机,‘机动帆船’起航”,“成渝经济区:打造‘中国电子谷’”,“高地呼唤‘川商’辈出”;行走在街道社区,他指出要“筑牢食品药品‘‘安全网’”,“打一场城乡环境

综合治理的人民战争”,“打造名城古镇应当坚持‘五要五不要’原则”……

智慧之书,慧在长远,梳理规律,构建体系,直抵心灵。作为大慧者,后强教授思考着行走。他用椭圆作为认识社会现象及其本质的“第三只眼睛”,以结构主义逻辑建构着多层次的社会管理理论体系——“椭圆社会学”,认为人类社

会是一个椭圆系统,具有多中心性、动态平衡性、差异协同性、多元包容性和渐进一致性,是一种以规则和规律为边界的共生社会、中和社会、和谐社会,规则和均衡就是椭圆的边界。

“弘扬长征精神,建设文化强国”,他提出,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和“长征文化”,以“长征路线”申报中国和世界文化遗产,可以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举措。在区域合作与发展方面,他提出了成都、重庆、昆明、西安联手合作的“西四角”发展战略,成渝经济区的“天环盆地”的设想。对于四川跨越发展,他思索得更多,不仅揭示着深层次的战略和理论,如“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走出内陆盆地,迈向发展高地”,“我们为什么要推进‘两化’互动”,“四川盆地何以虹吸全球‘财富’”,“四川为什么能够‘加快发展’”,而且也总结出一系列的经验,如“抗灾胜利属于伟大的四川人民”,“‘映秀保卫战’书写科学抢险实践”,“用好抗震救灾理念,筑牢避险减灾防线”……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智与



怀念父亲

李后强/文

清明是追思先人的时节。

到今年五月十四,父亲就离开我们整整三十年了。这三十年里,我没有天天思念父亲,但他老人家一直在我的心里,在我的行为中。对他老人家精神与品质地继承,就是我怀念父亲的方式。

父亲的善良和同情心是他老人家铭刻在我脑海中的第一个记忆。

我小的时候,农村穷得很,从年头到年尾,逃荒的、要饭的络绎不绝。他们有的拖家带口,有的独自一人,都可怜得很。我们能够活下来多亏了高产的红薯。红薯就是救人的菩萨。谁能够给要饭的一块红薯,就是积了一次德行。我父亲则同时给了他们尊重、同情和机会。

刘家就是一家人要饭到我们村的。父亲请他们吃了一顿饱饭,问了一些他们家里和灾荒的情况。刘家大伯见父亲善良,在村子里主事,就尝试着说,他是石匠和粉匠,不怕吃苦,看看能不能把人家留下干点活。这让父亲很为难,因为留下他们就意味要给他们分地,也就是意味着乡亲们得给他们让出一块地。但是,父亲答应试试。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乡亲们都有同情心,但也普遍有担心:我们这么穷,再让给他们5口人一些地,不就更艰难了吗?父亲不得不逐家逐户做工作,强调“咱们是贫穷,他们是挨饿,救救他们吧!”最终,绝大多数人同意匀给刘家几亩地,让他们留了下来。

另一个要饭的老伯则是走投无路。某年的大年初一,我们刚开始吃早饭,

就有要饭的进门。妈妈习惯地去拿馒头,父亲却让我搬过一把椅子,邀请要饭的坐下,让妈妈给他盛了一碗饺子。那要饭的不知所措,一时竟不敢接妈妈端给他的饺子。父亲友善地对他说:“老哥,坐吧!大年初一还出来要饭,肯定是不得过了。给俺家一起吃碗饺子过年吧。”那要饭的老人嘴唇打起了哆嗦,老泪也流了下来,颤颤巍巍地接过饺子,蹲下吃了起来。等他狼吞虎咽地吃完,父亲象熟人一样给他拉起了家常,问他家是哪里的?有几口人?身子骨可好?那老人一一回答,慢慢地有了笑容。

父亲的善良和同情心融进了我的血液。城市里开车,在红绿灯口遇到最多的就是乞讨者和发小广告。我从来没有对他们横眉立目,而是平静地落下车窗,平和地接过他们的小广告,或者给乞讨者一些零钱。我知道这帮不了他们的大忙,甚至算不上真正的善良,但是,我在给他们以尊重并力所能及的帮助。父亲看到这些,是会高兴的。

父亲的智慧和实干是他老人家铭刻在我脑海中的第二个记忆。

1980年代以前,导致农村贫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村的贫穷也是普遍的。但是,父亲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带领乡亲们从本村的田里优选良种,用多劳多得的方法鼓励乡亲们多积农家肥,以用粮食奖励勤劳的方法鼓励乡亲们多投入劳动,并深耕、精耕土地,实现了粮食的高产,保证我们村的乡亲们逢年过节都能吃上白面馍和饺子,逐步消灭了光棍汉。

吃饱的同时,父亲又想方设法改善

乡亲们的居住条件。1976年前,我们村没有一间瓦房。在父亲主持下,1976年,我们村依靠相互接济和村里适当帮助的方式开始了排房规划和建设。父亲从几十里外的地方请来了窑匠,以生产队的名义发动劳力箍窑,学着做砖、做瓦、烧窑;无论谁家盖房,生产队都补助400斤小麦,劳力都得按照村里安排去出工,并计工分。盖房的顺序是:谁家的房最简陋,就先给谁家盖,以此类推。凭着这种方法,实现了人心齐,鼓起了大家的干劲。到1982年,我们村家家都住进了瓦房,村里也有了东西南北相互贯通的道路。

父亲的智慧和实干始终鼓励我奋发图强,遇事多动脑筋,无论如何都不能怨天尤人。每当遇到误解、挫折、委屈、困难时,我首先选择地是反求诸己,其次是换个思路,并慢慢懂得了:所谓误解和委屈,其实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语境和沟通方法,而不是对立和冲突;所谓挫折和困难,其实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适合的方法和途径,而不是失败和障碍。

父亲的诚信是他老人家铭刻在我脑海中的第三个记忆。

父亲之所以能够把窑匠聘请到我们村,是因为他答应给四十多岁仍在打光棍的窑匠找媳妇。然而,窑匠干了一年多也没有盼到日思夜想的媳妇。于是,他开始怀疑我父亲的动机和信用,变得消极,甚至想走。我父亲就给他立下君子协议:如果当年仍然给他找不到媳妇,就让窑匠挑个我们本家的女人结婚。那一年,给窑匠找媳妇就成了父亲

的头等大事,他逢人就夸奖窑匠,遇到朋友就请人家给窑匠物色媳妇,并答应:谁给窑匠找到了媳妇,就奖励人家500斤麦子,还请人家喝酒。终于,老天开眼,当年成就了窑匠的媳妇梦。有趣的是,窑匠叫父亲“大哥”,他却让他的孩子叫父亲“爷爷”。

我小时候是不听话的,打架、逃学是家常便饭,为此没少挨打。然而,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打我大多是因为说谎,其次是逃学。他常常教育我:男孩子打架要是犯了个错,有啥要紧的,但说谎就很可恶,该打!不读书学习,就有出息,也该打!

成长过程中,我渐渐坚信了“诚信值千金”,人当以诚信安身立命。事实上,我也一直以诚信要求自己,宁愿吃亏而不能失信。我也逐渐明白了父亲坚持说谎必打的良苦用心。

父亲的勤劳和荣誉是留给我们兄弟姐妹的宝贵财富。

改革开放后,农村焕发了生机,父亲焕发了青春。他学习科学种田技术,

带领姐姐们苦干实干,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82年我们家给国家上缴了一万多斤小麦,成了远近闻名的万斤户,父亲被授予“河南省农业劳动模范”称号,去郑州参加了表彰大会,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还亲自到我们村开了现场会,到我家看望了父亲。

尽管直到今天我们姊妹几个也没有达到父亲当年的高度,但是,我们始终

以父亲为榜样,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

父亲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也让我终身受益。

我上小学四年级时,父亲给我买了本由电影转换过来的连环画《百万英

镑》。我一口气看完,特别满足。父亲适时地问我看后有何感想。我记得当时好像表达了这些意思:钱很不得了,有时能够混淆是非、改变世界,给富人找乐子,给穷人添困惑。我长大了一定挣好多钱,做好多好事。父亲一个劲儿夸我有思想、有志气、有胸怀:“俺娃儿长大一定能考上大学,干一番事业。”

我参加中招前,父亲已经重病在床。我到郑州看他。他半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仔细询问我的学习情况,一方面鼓励我考高中上大学,要求我不要上中专,另一方面,又宽慰我:只要努力了,考上哪里都问心无愧,正像戏词一样“千百里举子进科场,哪能个个美名扬。”

现在,我知道这叫欣赏教育。今天,读李后强教授的文章《待子如友真爱子》,才明白父亲把我当成了朋友。我也批评自己的孩子,但更多地是欣赏、鼓励和交流。这无疑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

如今,老家的面貌焕然一新。乡亲们不仅吃上了好东西,住上了好房子,见到了好景致,过上了好生活,而且通了电,修了水泥马路,开通了自来水,好多人还到外面打工,开阔了眼界,逐渐脱离了乡村。然而,我回老家时,总能听到乡亲们对父亲的夸奖和怀念;每逢清明和十月初一,我们回家给父母上坟烧纸时,总能在坟头见到已经烧过的纸钱、放过的鞭炮。

值此清明,感受着明媚的春光、盛开的鲜花、复苏的万物,我情不自禁地向天发问:我的父亲转世了吗?积善积德的父亲是否成了菩萨神仙?即使父亲没有成佛成仙,三十年来人间一直有怀念他,他老人家也该开心了吧?